



珍藏版

拾玖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老照片

1949年：蒋介石在溪口的最后岁月 郑春光

1903年：骆任廷的山东之行 张军勇

也说中国远征军 余戈

中国民航最早的华人机长陈文宽 张聿温

「文革」期间的一场足球赛 刘健平

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

「老照片」

OLD PHOTO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照片.第87辑/冯克力主编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3.1

ISBN 978-7-5474-0918-3

I. ①老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世界史—史料②中国历史—现代史—
史料 IV. ①K106 ②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8351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
6印张 145幅照片 120千字

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15.00元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,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须经本社同意。

出版人 尹奎友
主 编 冯克力
执行编辑 张 杰
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
美术编辑 王 芳



第八十七辑

目 录

曾 自	在父亲离去的日子	1
郑春光	1949年：蒋介石在溪口的最后岁月	22
张军勇	1903年：骆任廷的山东之行	42
彭 勃	我的父亲母亲	68
沈 宁	春天在远方	93
刘光生	二哥与他的画画爱好	100
余 戈	也说中国远征军	107
张聿温	中国民航最早的华人机长陈文宽	123
陈为人	孙谦长眠虎头山	136

沈 迦	冒广生的温州旧照	154
赵海成	欧美华人的抗日活动	160
胡 剑	西北南下工作团在四川	165
刘健平	“文革”期间的一场足球赛	177
伊 格	在西藏平叛剿匪的日子	181
冯克力	“正能量”与“负能量”	188

封 面	民国年间的民航飞行员（张聿温）
封 二	美军医疗人员在救治远征军伤员（余戈）
封 三	英辖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任廷与山东巡抚周馥合影（张军勇）

在父亲离去的日子

曾 自

打击突然降临

1966年5月23日对于母亲来说，无疑是天塌地陷的一天。那一天，我们的父亲田家英含冤离世了，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最早的受难者之一。

5月23日下午3时，母亲董边还在全国妇联，上午她刚刚在党组会上做完检查，因《中国妇女》杂志跟不上形势，作为杂志社社长，她责无旁贷。虽然暂时交了账，可内心没有稍许的安宁，母亲惦记着父亲，不知现在他怎样了。

就在昨天，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家里宣布：“田家英停职反省，交出全部文件。”在随后清理文件的过程中，父亲一直闷闷的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23日早晨，父亲问母亲：“中午回不回来？”母亲想着早已安排的检查一事，答道：“不回来了。”她见父亲靠在床上，似乎一夜未睡，便安慰了他几句，可父亲依旧未说什么。

现在家英会怎样了呢？情绪平静了一些吗？一向有主见的母亲，此时心里却七上八下没着落，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压

在心头。

正想着，突然接到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，让母亲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。

“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接待客人的地方，为什么要到那里去？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”母亲的心怦怦直跳。还没等她理出头绪，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。

会客厅里，安子文、汪东兴在座。他们代表组织对母亲直言宣布：“田家英畏罪自杀。”

难以令人置信的消息，使母亲一下觉得天旋地转，仿佛坠入了深渊。这是怎么了，早上还是活生生的，突然就与世隔绝，母亲控制不住自己，泪如雨下。



图1 1920年代末，田家英（左三）与家人的合影。



图2 1950年代末的田家英

安子文一定要母亲去看一下父亲的遗体，并且不断询问：“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？”“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？”

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有半站地，母亲不知道是怎么走过的，她实在无法接受家英“畏罪自杀”的现实。

永福堂西厢房是存放毛泽东图书的书房，父亲平躺在地上，身上盖着一条铺了多年的灰蓝色床单。汪东兴拉着母亲的胳膊往前拽，让她看清楚，认可田家英自杀的事实。

床单被揭开，母亲看到了父亲那张蕴涵着痛楚和悲愤的脸。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，失声痛哭……

这时，母亲耳边传来一声指令：“收拾东西，离开这里。”这是汪东兴的声音。母亲根本就没弄明白，她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和家英共同生活的家了。母亲只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，毛巾、牙刷、勺子，比出差还简单，连抽屉里刚发的工资都没动，便匆匆离开了。出门前，她看到父亲的手表端放在办公桌上，“也许是家英有意放下的”，母亲的心又一阵颤抖。她下意识地拿起了这块劳力士。以后的整个“文革”岁月里，这块表始终陪伴着母亲。

母亲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办的一处宿舍院。我和姐姐放学回家，被拦在中南海南门外，守候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送到了丰盛胡同。

当时我十四岁，姐姐十六岁，都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。那时的我们完全不谙世事，中南海里长大的孩子，更缺少社会经验，根本不会想到家中出了大事。只是对突然离开中南海的家感到不解，对母亲睁着询问的眼睛。记得当时我心里最舍不得的，是家里那些伴我们长大的小人书。

晚饭，全家是在丰盛胡同口一家饺子馆吃的。我看见坐在对面的母亲，饺子夹到嘴边又放下，半天没吃下一个。母亲眼圈红红的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始终没有落下来。那时我太稚嫩，真的什么也不懂，但母亲那强忍痛苦的眼睛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母亲才详细地同我谈起那个难忘的不眠长夜。

照顾我们入睡后，已是夜深人静。母亲的心波澜翻卷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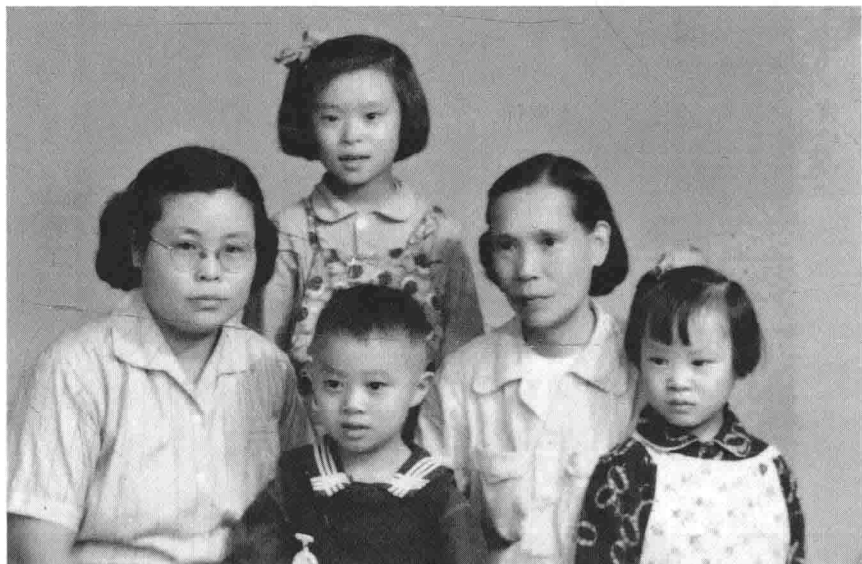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摄于1957年夏

无眠的长夜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是一句话：“家英为什么要自杀？”昨天下午的情景不断在脑子里浮现。

5月22日是星期天，下午3时，安子文、王力、戚本禹代表中央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，向田家英宣布：“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，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；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。因此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，交出全部文件，明日搬出中南海；中办秘书室的工作，由戚本禹负责。”没有做任何解释，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。

戚本禹留下督促交文件，从下午到晚上，母亲一直在帮助父亲清点文件，包括正在编辑的《毛泽东选集》五卷过程稿。父亲为研究党史收集了不少未公开的重要资料，其中一件是胡

乔木当年记录的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的讲话，建国初，父亲借来让母亲抄了一份。父亲特意从书架上抽出来问：“这个交不交，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。”母亲说：“交。我不怕！”父亲这才把它放进要上交的文件中。

下午6点，母亲到父亲最可信赖的秘书逢先知住的东厢房，请他帮助回忆一下1962年包产到户的事，那是明确批评田家英右倾的开始。文件清到午夜12点，突然，红机子电话响了，通话很短，母亲没听清说了什么，只见父亲摔了听筒，气愤地对母亲说：“戚本禹好神气，他算什么？我就是不去签字！”母亲这才知道，电话是戚本禹打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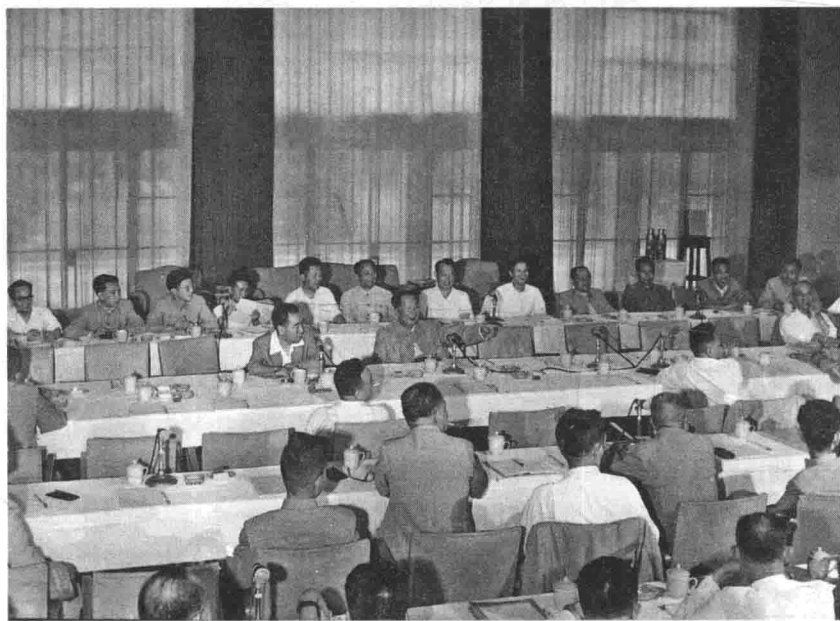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1960年代，田家英（前排左二）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。



图5 1961年3月，中共中央召开广州会议，前排左三为田家英。

戚本禹是1950年调进中南海，在中办秘书室做信访工作的干部。平日他爱写些东西，爱学习，父亲对他的学习精神，曾多次表扬过。1963年，戚本禹发表了《评李秀成自述》，文章带有政治批判的色彩，引起了关注。很快，陈伯达把戚本禹调到了红旗杂志。在不断为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造势的形势下，戚本禹被江青看中，逐渐受到重用。

此时的戚本禹，接替了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位置，他在电话中的口气，一定使父亲感到了不堪忍受的侮辱。

母亲见父亲脸色不好，想到他一直没有吃饭，做了两个荷包蛋，劝父亲吃点东西先休息，有什么事以后慢慢说清楚。父亲站在那儿没动，片刻，他像是对母亲，又像是自语：“我的问题是江青、陈伯达陷害的。想不到在主席身边工作十八年，落得如此下场……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！”

母亲知道，家英对江青历来不敬不畏，避而远之。至于陈伯达，家英与他共事长达二十五年。陈品行虚伪，遇大事见风使舵，家英对其不留情面，长期斗争。有次母亲跟父亲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总是和陈伯达斗呀斗的，你们的斗争是什么性质？”家英竟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当然是阶级斗争！这个人是伪君子，野心家，不斗行么？”

想到此，母亲有些难以推理下去了，她了解家英对江青、陈伯达的一贯看法，对他们，家英从未畏惧，可为什么今天突然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

母亲在后来的“回忆实录”中这样追溯：“那晚我心如刀绞，彻夜未眠，我真悔呀！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把问题看严重些，悔不该再去上班，没有陪伴在家英身边，现在家英义无反顾地去了，可孩子们还小，她们爱爸爸，怎么向她们解释呢？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承担起来……”

妇联第一个被揪出的“走资派”

由于父亲被定为彭、罗、陆、杨反党集团的骨干，母亲受牵连是必然的。1966年7月，母亲就被扣上“走资派”的帽子，成为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个被打倒的人。

单纯善良的母亲太相信问心无愧了，第一次被批斗，她居然端着水杯，拿着检查提纲，坐到讲台上发言。没过三分钟，台下就有人喊：“她还以为是书记作报告呢？把她揪下来！”

母亲立即被推搡到台下，被迫低头站着，大帽子一顶一顶地扣上来，而且不容她分辩。“董边是历史反革命，现行反革命，黑帮分子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和丈夫开黑店，卖黑货，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！”

当说到“董边和丈夫一起开黑店”时，××，一位资格很老的领导突然高声喊道：“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！”她的话立刻引发激愤，人们冲上来，把母亲从台角拉到中央，喝令她交待与丈夫一起开黑店的事实。

母亲的心在抽搐，家英去世前说的“想不到……落得如此下场”的话，在脑际闪过。

母亲一贯反对夫贵妻荣，看不起依靠丈夫的女性。她出生在封建家庭，男尊女卑的歧视，磨练了她不屈不挠的性格。她的人生，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努力。从1948年到邓颖超领导的中央妇委工作，十八年来，母亲把全部的心血都扑到了妇女工作上。她主持的《中国妇女》，从初创时发行五万份，最终增至九十万份，成为全国四大刊物之一。她的自强不息，连父亲都十分敬重。

一次主席要去杭州，让父亲带上爱人。父亲说：“我可带不动她。”得知田家英的爱人是做编刊工作的，毛说：“原来也是个耍笔杆子的喽。”

黑白完全颠倒了，仅仅因为丈夫的“问题”，自己就被推入任意诬陷的泥淖。直到这时母亲才醒悟，“反革命”的结论早已定下，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吧。

1966年8月25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为毛泽东题写《中国妇女》刊名发消息。同时点了母亲的名:“罢了黑帮分子董边的官,夺回了《中国妇女》这个宣传阵地。”母亲被推向妇女界罪大恶极走资派的深渊。

批斗从此接踵而至,母亲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。残酷的打击,使她精神过度紧张,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。

母亲是党报点名的黑线人物,劳改时,任何人都可以对她施加凌辱和谩骂。寒冬腊月,让她给机关的办公大楼生炉子。造反派要求上班后不能闻到烟味,母亲每天凌晨5点就得起身。自幼患有哮喘的母亲,需用一只手捂住嘴再干活。

一次,专案组组长遇到母亲往三楼提煤,在后边大吼:“劳改还带什么手套,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,摘掉!”那人一面骂着,一面将母亲的手套扔进垃圾箱。类似的侮辱,随时都会发生。母亲一声不吭,咬牙坚持着。

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

母亲的《回忆实录》有这样一段,每读到它,我的心就陷入深深的痛楚中:“‘文革’中我从未想到过死,但有时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。那时我只想,我要坚持活下去。家英留下遗言,‘相信不会冤沉海底!’……再有,也确实是为了孩子。被开除党籍那天,我伤心地哭了。我想我从青年时就把一切都交给了党,党却不要我了,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?可孩子们还需要我,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,将来会转过来的。她们的父亲死了,我要是再不在了,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



图6 1964年夏，田家英陪同邓小平等视察东北林区。

呢？一定要活下去，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……”

在那是非颠倒、头脑狂热的年代，尚未成年的我们，从优越的环境一夜沦为社会的弃儿。在我眼里，母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，特别是当我隐约知道了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，惊骇、怨恨、困惑参差而生。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和不安。

但是，“文革”这场浩劫，谁都没有避风的港湾。你必须在“革命”和父母之间做出选择，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让你难以接受时，温文的女孩，变得粗犷。“文革”开始的三年，我没有唤过母亲一声“妈妈”。和母亲一起生活，她只要对我的某一做法提不同意见，我就会毫不客气且理直气壮地反驳她，

“还说我呢，你自己的问题还没交代好呢！”每当这时，母亲的脸就涨得通红，她不辩解也不再吭声，埋头做手中的家务活儿。我只知道自己被排斥在“革命”之外的委屈，却不懂母亲每天被“造反派”任意诽谤诬陷，精神和肉体承受着怎样的摧残。我彼时的言行，无疑是在母亲心灵的创伤上，又撒了一把盐……

作为母亲，她何尝不渴望孩子们的理解，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。对家英的自杀，对她被扣上的无数顶“帽子”，若一味采取否定的态度，不仅不能使我们思想转过来，而且是在否定过去教育我们的一切。面对极大的不公正，母亲所说的只有一句话：“相信党，相信组织。”

“文革”中，母亲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，她把一切的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心里，尽其可能地使我们感到和其他孩子一样。她把挨斗时挂的打了红叉的大牌子，藏在褥子最下层，不让我看到。那时粗粮多、细粮少，母亲自己一天三顿吃窝头，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到我碗前。

1967年秋扣发了母亲的工资，专案组每月只给我们母女三人五十五元生活费（母亲十五元，我和姐姐每人二十元）。粮、油、米面、煤，母亲精打细算，安排完必须的开支，她每月一定要省出一元钱给我买水果糖。在扣发工资前一两个月，母亲似乎已有预感，一下为我和姐姐添置了好几件新衣服，还买了一斤绿色的纯毛线，一针针地给我织了条新毛裤。在此之前，我还从未穿过纯毛线的毛裤。

从搬出中南海到那年7月，我们被迫搬了四次家。最后落脚在妇联宿舍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平房，就在这小小的陋室，留下了我们母女间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。